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86

## 先秦两汉“孔子问礼于老子”文献用例

时尚<sup>1</sup>

(<sup>1</sup>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 在孔子问礼于老子被当作常识、典故运用到文献中时, 这个事件被赋予更多求学问礼之外的意义。其中有一个运用方式值得探讨: 孔子向老子问礼被凝练成孔子“师事”老子, 并被纳入选定的“师事”序列中, 着重强调“师”的意味。以“师事”序列为切入点, 可以分析孔子地位的变化及孔老关系的变化与影响, 指出经学背景下帝王之师观念蕴含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 孔子问礼, 师事, 孔老关系

### 一、《吕氏春秋》中的论述

《吕氏春秋·当染》载: 非独国有染也。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此二士者, 无爵位以显人, 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 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 从属弥众, 弟子弥丰, 充满天下, 王公大人从而显之, 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 无时乏绝。……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 不可胜数, 皆所染者得当也。<sup>[1]</sup>

《当染》是一篇完整的议论文, 思路清晰, 结构完整, 从生活中染丝需要得当, 引出治国治天下的王者也需要选择合适的大臣、受到得当的影响, 进而再引出学习同样需要选择合适的老师, 受到得当的影响。对王者治天下而言, 用人得当才能够取得“王天下, 立为天子, 功名蔽天地”的效果, 使王者获得“天下之仁义显人”的盛名; 称霸一方的诸侯治国用人得当也能“霸诸侯, 功名传于后世”。对学生学习而言, 择师得当才能够从“无爵位以显人, 无赏禄以利人”的窘境摆脱出来, 成就“举天下之显荣者”的功业。两相比较, “当染”是个人选择, 能带来的主要也是个人利益。但学习还可以带来长远地良性循环, “王公大人从而显之, 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 无时乏绝”, 好的老师可以教出好的弟子, 好的弟子又可以成为好的老师, 代代相承, 不过, 《当染》强调的是“王公大人”或王公大人的子弟可以求得名师, 使得家世更加显贵, 代代相传; 治天下治国相对而言要险恶得多, 即便“伤形费神, 愁心劳耳目”, 重其国、爱其身, 也会因为所染不当, 遭受“国残身死, 为天下僇”“国皆残亡, 身或死辱, 宗庙不血食, 绝其后类, 君臣离散, 民人流亡”的恶果, 沦为“天下之不义辱人”、“天下之贪暴可羞人”。

文章中出现了一个根据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确立的序列, 由高到低依次是 A 治天下的王者 > B 治国的国君 > C 王公大人 > D 无名无利的学者。ABC 三类人是否当染会影响到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 但对于 D 无名无利的学者而言, 所染得当能带来利处, 获得名利, 所染不得当倒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好像名利是他们的“身外之物”, 得不到才正常。并且, 无名无利的学者所染得当能带来的最大好处竟然是帮助前来求学的王公大人获取和存续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否也这么残酷, 并不能直接据此推出。但《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众门客所撰, 是政治势力整编学术思想的一次尝试, 凭借学识被召集撰书的学人将自己的境地写得如此难堪, 也可以想见无名利学者的为学不易。所以, 《当染》中的“孔子学于老聃”就只是一个学者的求学故事, 并没有更深含义。

《吕氏春秋·尊师》和《当染》有相似的行文结构, 身份区分更加明显, 并且已经开始表露“师”的特殊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出土简帛与秦汉时期算术问题相关研究 (KYCX24\_3394)

**作者简介:** 时尚 (2000—), 男, 洛阳人, 苏州科技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含义。

(1) 从名词使用上来说, 治天下治国的圣人贤者求教于人称“师”: 神农师悉诸, 黄帝师大挠, 帝颛顼师伯夷父, 帝喾师伯招, 帝尧师子州支父, 帝舜师许由, 禹师大成赞, 汤师小臣, 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 齐桓公师管夷吾, 晋文公师咎犯、随会, 秦穆公师百里类、公孙枝, 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 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 越王句践师范蠡、大夫种。此十圣人、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sup>[1]</sup>

而“学”适用于所有人——“凡学, 非能益也, 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 是谓善学。”主要是学“义”, 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 子张, 鲁之鄙家也; 颜涿聚, 梁父之大盗也; 学於孔子。段干木, 晋国之大狙也, 学於子夏。高何、县子石, 齐国之暴者也, 指於乡曲, 学於子墨子。索卢参, 东方之钜狡也, 学於禽滑黎。此六人者, 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 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 以终其寿, 王公大人从而礼之, 此得之于学也。<sup>[1]</sup>

(2) 从内涵上来说, 《尊师》确立了一个师道原则:

君子之学也, 说义必称师以论道, 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 命之曰背; 说义不称师, 命之曰叛。背叛之人, 贤主弗内之於朝, 君子不与交友。故教也者, 义之大者也; 学也者, 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 莫大於利人, 利人莫大於教; 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 成身莫大於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 为人臣弗令而忠矣, 为人君弗强而平矣, 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sup>[1]</sup>

从外延上来说, 任何人, 即便是最位高权重的天子也受师道约束: 天子入太庙祭先圣, 则齿尝为师者弗臣, 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sup>[1]</sup>任何人, 只要做好学问, 就应该获得相应的尊重: 故子贡问孔子曰: “后世将何以称夫子?” 孔子曰: “吾何足以称哉? 勿已者, 则好学而不厌, 好教而不, 其惟此邪!”<sup>[1]</sup>

《尊师》在普遍意义上推广好学要求时, 以孔子作为代表, 是否暗示孔子在敬学尊师的原则中享有独特地位? 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论证之前, 本文并不进行过度诠释, 但也不否认这个行文安排与后世尊奉孔子为“至圣先师”有太大巧合。

## 二、汉代诸书对该事例的使用

现存汉代文献中, 最早使用孔子问礼于老子事件的是《韩诗外传》: 哀公问于子夏曰: “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 子夏曰: “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 未之有也。”哀公曰: “然则五帝有师乎?” 子夏曰: “臣闻黄帝学乎大坟, 颛顼学乎绿图, 帝喾学乎赤松子, 尧学乎务成子附, 舜学乎尹寿, 禹学乎西王国, 汤学乎贷乎相, 文王学乎锡畴子斯, 武王学乎太公, 周公学乎虢叔, 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 未遭此师, 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 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诗曰: “不愆不忘, 率由旧章。”<sup>[2]</sup>

《韩诗外传》很明显有一个既学且能“安国保民”的帝王序列, 以时间顺序从早到晚依次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 孔子赫然位列其中。与孔子被排除在外的《吕氏春秋·尊师》神农、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句践序列对比, 还可以发现: 在《吕氏春秋》中, 周公仅仅是王者师(“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 在《韩诗外传》里, 周公变成了承接文王、武王的周代第三个圣王。周公和孔子这个“乱入”的变化应和孔子的“升格”一起作为研究以《韩诗外传》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政治观的材料。除周公和孔子外, 《韩诗外传》序列的条件比《吕氏春秋》更加严格, 只有从可考的五帝开始到成书时的圣王可以列在其中。帝王所“学”, 并不再着眼于对帝王个人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的影响, 而落脚于对国对民的政治意义。文献对师事的叙述已然转换视角, 为著者的政治主张作张本。但囿于《韩诗外传》的体例, 这一主张隐匿在“不愆不忘, 率由旧章”的释读中。

西汉末年的刘向《新序》中也有与《韩诗外传》近乎相同的段落。只不过微调帝王有师的序列, 换了几位帝王师的姓名: 黄帝学乎大真, 颛顼学乎绿图, 帝喾学乎赤松子, 尧学乎尹寿, 舜学乎务成附, 禹学乎西王国, 汤学乎威子伯, 文王学乎铎时子斯, 武王学乎郭叔, 周公学乎太公, 仲尼学乎老聃。<sup>[3]</sup>

并加一句评论: “夫不学不明古道, 而能安国者, 未之有也。”强调帝王之“学”对安国保民的积极意义。

《新序》紧接着记录了和《吕氏春秋·尊师》相近的段落, 完整保留了治天下治国的圣人贤者“师”事事迹, 并录《尊师》“善学”要义, 但与《新序》前文一致, 改“师”为“学”, 表露刘向搜集、整理文献的痕迹。收录两则师事材料的《新序·杂事》记载的全是帝王杂事, 刘向将两段与“学”相关的文字改动后编排在一起, 突出帝王之“学”, 具有讽谏帝王善学的政治意味。

东汉《白虎通·辟雍》整合“学”与“师”之间的关系, 完整论述古人求学尊师之道: 故学以治性, 虑以变情。故玉不琢, 不成器; 人不学, 不知道。……是以虽有自然之性, 必立师傅焉。《论语·子罕》曰: “五帝立师, 三王制之。传曰: 黄帝师力牧, 帝颛顼师绿图, 帝喾师赤松子, 帝尧师务成子, 帝舜师尹寿, 禹师国

先生，汤师伊尹，文王师吕望，武王师尚父，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天子太子，诸侯世子，皆就师于外，尊师重先生之道也。<sup>[4]</sup>

天子和诸儒对“帝王有师”达成共识，将尊师重道列为天子太子、诸侯世子的基本原则。诸儒的政治主张成为确定的政治实践原则。天子应该有师、天子应该尊师，“师”往往都包括儒者在内，师生关系可以形成儒者与政治最高权力的固定连结，儒者由此获得参与政治的特殊途径，以期实现“君臣关系”不能完全达到的政治愿景。由于“帝王师”的身份必须通过天子来确认，“帝王师”的政治权力必须通过实际官职和与天子的实际政治互动来实现，儒者在政治关系中仍然处于被动地位，往往达不到理想政治效果。

至《白虎通·辟雍》为止，帝王师的论述已经十分成熟。纵观前后汉，生从来都关切政治，汉代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儒生探寻着理论上的入仕途径，也积极在现实中施展政治抱负，“帝王师”是儒生试图与天子达成的和谐关系。以西汉张禹为例，张禹善学《易》与《论语》，“经学精习，有师法”，经人推荐，“试为博士”。为太子讲《论语》时，迁光禄大夫官职。太子即位，即成帝，“以师赐爵关内侯”，张禹获封六百户的爵位，官职也逐步攀升，直至诸吏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在张禹与权臣不合自请辞官时，成帝力劝张禹继续从政，并给予丰厚赏赐和更高的官职爵位。张禹再次请辞成功后，成帝依旧给予他非常高的“如丞相”待遇，加爵，甚至违礼赐张禹帝陵近处的墓地；更重要的是，张禹虽然无官在身，又“特进为天子师”，定义国家大政，成帝每每听从张禹的意见。成帝驾崩，张禹仍事哀帝，获谥“节侯”。张禹非一人独荣，他的儿子、弟子也都成为当时显贵。张禹的个人经历实在是太成功，太接近儒生的理想状态，张禹的学问也因而尊贵，广为流传。《张禹传》中分两方面描述了经学帝师和天子的和谐关系：（1）“朕以幼年执政，万机惧失其中，君以道德为师，故委国政。君何疑而数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无闻焉。君其固心致思，总秉诸事，推以孳孳，无违朕意。”天子时刻重视个人道德，寻求明经义、知道德的经师作为帝师，并委以参与国政的权力，给予百分之百的信任。帝师也安然地接受政治安排，在其位、谋其政。（2）“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sup>[5]</sup>天子通过向帝师学习经术，习得辨别合理经义的能力，并用经义经术处理政事，与臣民同享天下大治的善果。这两方面点明经学思想中天子和帝师、天子与帝师所代表的经义的关系，为天子和儒生提供了一步步“行动指南”。

至此，“师”彻底升华出学术之外的政治含义。东汉末年《潜夫论·赞学》载：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智；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善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sup>[7]</sup>

周公和孔子的地位等同于历史上的圣君，这就造成理论与史实的矛盾。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周公的圣君地位可以通过考证周公是否称王得以化解，孔子的圣君地位却完全无法从历史角度自圆其说。而从思想的角度，孔子可以成为“素王”，成为五德终始说的一环，可以为孔子订做一套适用的解释框架使孔子的地位、经学的地位确定下来。正是今文经学完成了这一解释任务。

即便如此，在这个帝王师序列中，仍旧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子师老聃”。老子和孔子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从皇帝到周公，都能够选择一位贤臣作为老师，但孔子如何选择、怎样选择才能符合孔子的身份？作为素王的孔子没有贤臣，作为学者的孔子真有自己的问学的老师。经学家于是沿用“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和用例，升华为“孔子师老聃”，没有再做进一步解释。当孔子和老子的地位发生变化，儒道关系逐渐紧张，“孔子师老聃”这个搁浅的理论问题就会成为进一步深化儒家学说的障碍。唐代韩愈一面在文论策论《师说》《进士策问十三首》中称引“孔子师老聃”“孔子问礼于老聃”，一面在研究著作《原道》中质疑孔子师老子的荒诞离奇，他为儒生也为自己作解——“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sup>[8]</sup>后世学者，主要是儒家学者对待“孔子问礼于老子”是否存在相应史实的争论也面临韩愈式的困境，是否承认存在孔老师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竟然成为学者表明儒道立场、发展学术理念的阵地。

### 三、选择“孔子师老子”的原因分析

在战国文献中，孔子好学，所师甚众，“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sup>[9]</sup>而至汉代文献，被称为“孔子师”的只有老子和项橐。在上文的师事序列中，仅列孔子师老子。为何文献中会有这样的取舍？本文尝试逐步做出分析。

#### 1. 孔子师项橐

孔子如何师项橐，在早期文献中没有详细记录。项的资料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sup>[10]</sup>、《史记·樗里子

甘茂列传》中甘罗引“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为例请求年少为政。<sup>[9]</sup>《新序·杂事五》闾丘邛引“昔有颛顼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sup>[3]</sup>，同为请求年少为政，但刘向刻意将闾丘邛之事编排于此，有劝学意味。《淮南子·说林训》“吕望使老者奋，项託使婴儿矜，以类相慕”将吕望、项橐一老一少并举，营造民间积极向学的氛围。高诱注云“项橐年七岁，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sup>[11]</sup>补充了项橐为孔子师的情节。王充《论衡》“项托七岁，其三四岁时，而受纳人言矣”，<sup>[12]</sup>增加了项橐的神童色彩。

项橐的事迹难考，仅有“为孔子师”一事，在汉代已引起辩论。《淮南子·修务训》载：“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以年之少，为闾丈人说，救敲不给，何道之能明也？”<sup>[11]</sup>否认孔子能从项橐之言中学到“道”。王充《论衡》“云项托七岁，是必十岁，云教孔子，是必孔子问之。”彻底否认了孔子师项橐的真实性。<sup>[12]</sup>但从《论衡》中王充与人的论辩可以看出项橐的事迹是时人信手拈来的常识。

文献中的项橐，几乎没有单独出现，总是代表着“以类相慕”的“类”运用在举例说明中，与项橐共同称引的神童有尹方、甘罗、颛顼等。项的事迹主要发挥“以类相慕”的作用，鼓舞同龄“婴儿”，为同样有抱负的少年神童所用，争取政治机会。汉代有很多见于史书的真实神童故事，如扬雄、郑玄、孔融等，其中齐鲁地区的神童最多。项橐作为齐鲁地区较早历史时期的神童，其事迹广泛流传，对当地的文化发展和童蒙教育应产生过积极影响。《隶释》卷一〇《童子逢盛碑》用“才亚后橐，当为师楷”赞扬年十二而天的逢盛，项橐成为同龄人的楷模，不仅反映出当时当地浓重的文化风气，也肯定了项事迹的文化意义。

除了以上材料外，孔子师项橐在经学文献中似有记载。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人，项橐也。”<sup>[13]</sup>钱穆考证“汉儒相传，殆均以达巷党人即项橐也。”项橐被赋予不学而知自知的特性。王充《论衡·实知》涉及项橐时正在与人争辩圣人是否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王充反对讖纬将圣人神化，认为学问定有来源，而这一神化过程可以追溯到董仲舒。项橐在这仅有的经学记载中也仍然只带有为学的意义，并没有前文“帝王师”的涵义，但开始带有神话色彩。这一性质决定了项橐不可能出现在帝王师序列中。

## 2. 孔子师老子

从可考的汤、文、武、周公师事故事，可以尝试分析为何只有孔子师老子被列入帝王师序列中。

汤以上各帝王之师难考，带有一定的神仙色彩。赤松子被列入《列仙传》；尹寿在道教著作《老子道德经序诀·太极隐诀》中被尊为“尹先生”；《汉书·艺文志》房中家著录《务成子阴道》三六卷，小说家著录《务成子》十一篇。文献中能考其事迹者除老子外，只有伊尹、太公望、虢叔三人。

汤和文王之师最初也不可考，后改师为伊尹、姜尚，带有明显的整编痕迹。《孟子》明确记载汤学于伊尹：“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sup>[13]</sup>《史记》、《左传》的虢叔仅在政治事件中有所行动，并没有师事记载。根据蔡邕《郭有道林宗碑》以“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实有懿德，文王咨焉”，《论语·讖》、《白虎通》可能也是以虢叔懿德堪为王师。虢叔从“文王咨焉”至武王、周公时期，年岁已长，更宜为王师。《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文王招吕尚，又以之为谋士、军师，参与多次军事决策和行动。<sup>[9]</sup>《荀子·臣道》以殷之伊尹，周之太公为“圣臣”。<sup>[14]</sup>至刘向《说苑》在《君道》、《贵德》、《政理》、《指武》篇记录七次武王问太公，《佚文》又记武王问“贫富岂有命”，展现武王时常咨询太公的场景。文王、武王、周公三人承继，可能有共同的老师，因而将姜尚从武王、周公时期的老师提前至文王、武王时期，有一定合理性。而由汤“学于待子相”改为“师伊尹”，表现出文献整理者重新考量了“为师”的条件，将可考的文化传统中的从道者列入帝王师中，儒家的政治观成为整编帝王师序列的关键因素。

帝王之师序列中年代最晚的“孔子师老子”，是诸书中唯一相同的师事举例。相较于孔子所严事的其他人，孔子师老子影响最深远。孔子曾向子产、晏子、孟公绰、蘧伯玉学习政治思想和德行，向苾弘、师旷学乐，所学甚广。而孔子在向老子求学时，集中于问礼，探讨过求道，所学内容更深入，接近孔子思想的核心。且老子在先秦和汉代的学术地位远高于孔子师事的其他人，黄老思想一度被汉代统治者尊崇，将老子作为孔子师的代表完全可行。

除政治因素外，老子长寿，生平难考，以隐为务，与伊尹、太公望、叔之外的其他帝王师也有诸多相似特点。老子学说强调无名，无为而无不为，不会执着于“孔子师”的名分。种种因素促成汉代文献不约而同地将“孔子师老子”作为纳入帝王师序列的最佳选项。

## 参考文献：

[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赵仲邑.新序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吴则虞.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汪继培.潜夫论笺[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韩愈.韩愈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0]范祥雍.战国策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1]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黄晖,刘盼遂.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22.  
[1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4]沈啸寰,王星贤.荀子集解 [M].北京:中华书局,2022.

## Cas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Confucius Asking about Rites and Laozi" in the Pre Qin and Han Dynasties

Shi Shang<sup>1</sup>

<sup>1</sup>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Abstract:** When Confucius' inquiry into etiquette was used as common knowledge and allusions in Laozi's literature, this event was endowed with more significance beyond learning and inquiring about etiquette. One of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worth exploring is that Confucius asked Laozi for etiquette, which has been condensed into Confucius' "teaching" Laozi and included in the selected "teaching" sequence, emphasizing the meaning of "teacher". Starting from the sequence of "teacher affairs", we can analyze the changes in Confucius' sta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the elderly, and point out the political ideals contained in the concept of imperial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fucian classics.

**Keywords:** Confucius asks about etiquette, teach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elders